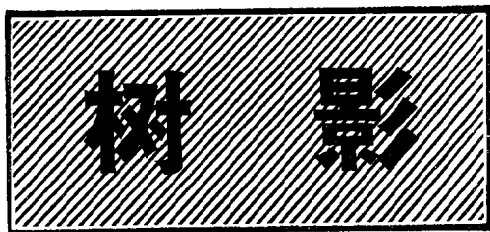


树影

〔日〕 佐多稻子 著





〔日〕 佐多稻子著

树 影

(日本)佐多稻子著

文洁若 韩 铎 曾丽娜译

责任编辑:林怀秋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8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183,000 印张:8.125 印数: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:10109·1226 定价:0.76元

他俩什么都没有谈吗？他俩果真什么都没有谈吗？他俩确实不是多嘴多舌的人。这首先是他俩的素质所决定的。一定是他俩心里都有些别扭，不便畅谈出来，所以他们总不喜欢饶舌，其实，这首先还是他俩的素质所决定的。说不定他俩相互之间也没有用言语倾诉过彼此心中的挚情。他们双方都有谅解对方的一面，又各自怀着被压抑的焦躁，这就使得他俩保持缄默。莫非可以说，他俩甚至把彼此谅解的心情，以及被压抑的焦躁，都代之以自我谴责了吗？他俩的爱情，不是世俗上正常形式的爱情，结果日常的生活琐事无疑就使他俩的感情受到挫折，他俩也就听之任之。这在他俩心灵中的某个角落起到了姑息、掩饰的作用。也可以说，他俩就是靠这种掩饰来抑制灵魂深处的焦躁和恐怖的吧。这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，他俩不喜欢多言多语。毋宁说，他俩几乎不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他俩的焦躁和恐怖已经深重到连两个人之间也不便谈论的地步。他俩只把这当作一道微妙的阴影，甚至连自己都欺瞒过去。在漫长的十年岁月里，他俩经历了种种坎坷崎岖的路途。他俩终于不得理会到，这个阴影在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裂痕，在各自悲哀凄楚的心境中，渐渐变得明显起来。

直到战后第三个年头的夏天，长崎的市街仍然被遗弃在荒凉颓败之中。但是，由于包括市中心在内，城市的三分之二幸存下来了，所以生活还能够继续，人们好容易又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奔了。那一条条大街，有的马路两旁装着格子门的旧式住宅鳞次栉比，有的环山蜿蜒着狭窄的石阶，有的沿着河，有的顺着缓坡铺着石板，还有那石墙跟前的集市和木造的洋房林立的海滨街，保留着陈年老店的商业区，以及那排列着红砖砌的货栈的街道……这一切，都还显露出长崎特有的古老风貌。尽管看起来一如既往，却到处象蒙上了白糊糊的尘埃。港口里只有小船在进出，从海湾那边的造船厂传来断断续续的机器操作声。当年在白色闪光中燃烧、被热风卷走、化为焦土的市街，如今依旧是荒地一片，显得冷冷清清。医科大学校舍只剩下了一些断墙残壁，被一人高的杂草包围着，活象一座被埋没多年的古代废墟。然而仅仅三年前，那里曾变成人间地狱，至今还阴森森地笼罩着悲愁。就这样，三年前的创伤，不论在哪条街上，都表现得一目了然。但是，人们不得不从这里迈开脚步，默默地背负着阴影走向未来。现在，长崎的大多数人都还是死气沉沉。在那用孟加拉漆涂刷的黄赤色格子门里面，躺着下半身瘫痪了的少女。在那铺着石板的斜坡旁的人家里，还住着因为脸被烧伤而面带愁容的年轻人。这种痛苦和怨恨广泛地潜伏在医院里和街头巷尾。它是那么深重，人们自然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。战后重整家园的新风气，在这个城市里也传播开来。即便到了这一时刻，人们对自己的城市和自己本身的悲惨遭遇，也还是讳莫如深的。

就在这一年夏季，有一天，快晌午了，烈日当空。柳庆子打着遮阳伞，快步穿过滨町，向麻田晋的画室所在的袋町走去。身穿浅蓝色衬衫的庆子，肩膀略宽，身材苗条，个子较高。她那前

额白净的长脸蛋儿在这条街上并不特别显眼。人们即便发现她刚刚从新地的自己家里走出来——也就是说，知道了她是个华侨，也决不会大惊小怪，只不过是瞅瞅她脸上那细瓷般的白皙皮肤而欣然领悟：噢，怪不得！

柳庆子迈着急促的脚步郑重其事地朝麻田晋的画室走去。她曾在思案桥火车站附近经营过一家小小的茶馆。不久以前，由于和房东闹纠纷，暂时停业了。最近，她刚刚又在离新地和老店都较近的地方，另外租到了一座铺面房。柳庆子家里有年迈的父亲，还有两个妹妹。作为长女，她要肩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。她正雄心勃勃地张罗着新店开张的事，找麻田晋就是为了请他帮助自己设计新茶馆。以前，柳庆子曾想改建老茶馆，经一位顾客介绍，认识了麻田晋。两个人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。现在，柳庆子专程去拜托麻田晋设计新茶馆，她心里着实感到高兴。想起麻田晋那喜欢昂首的脸庞，以及自负中透着温存的眼神，她又觉得有点胆怯。

从袋町电车站前面往左一拐，就可以瞥见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原公众集会厅大厦。这幢大厦本来已经半倒塌了，几乎化为废墟，当地的报社把它草草修缮一下，就使用上了。麻田晋在报社楼下租了一间房作为画室，和一位朋友合伙，做起承包广告设计的生意来。麻田晋原来是个画家，在战争结束以前的八年当中，每年都有作品被选入首都的“D画展”。但是，现在还不是他能重新靠绘画谋生的时候。

庆子一路走去，中午的烈日下，周围寂静得什么声响都没有。走到哪里，阳光都照得明晃晃的。报社那幢草草修缮了一下的大楼，四周是一大片由于建筑物拆迁而腾出的空地。这里现在种满了南瓜，绿叶覆盖着广阔的地面，长得十分茂盛。边边角角上还

有一些高高的美人蕉，鲜红的花朵盛开，似乎要和灿烂的阳光争奇夺艳。离县政府很近的这一带，如今竟有这样的景致。走到南瓜地边，庆子伫立了一会儿。窗户里露出了麻田晋的脸，他和庆子的目光相遇后，就表示“请进”似的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看，这么窄。”

当庆子脸上浮着微笑默默地走进的时候，麻田迎接她说。他将两把简陋的椅子当中的一把搬到小桌前。

“让你久等了吧？”庆子说话的腔调是先抑后扬的，细声细气，清脆动听。

“不，我总得在这儿干点什么。”麻田回答说。

他略微仰起头，眼睛从正面盯着对方。他的表情一点也不严峻，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，但庆子不知道往哪儿看才好。这房间挺窄，正如麻田当初所说的，只有六铺席大小。大概原来是堆房吧。房中有一张钉死在那里的粗糙的单人床，角落里丢着好几个原来装油漆的空桶。一面墙上，斜搭着一块没有画完的画布，下面七零八落地放着各种颜料。庆子思忖着：这就是他的画室吗？她好象窥见了麻田晋的生活似的。麻田想赶快谈正事，就自己先开腔道：“好极了，又找到了新铺面！”

“总不能老这么闲呆着啊！真愁死人了。好容易才……”

把话说到半截就打住，这也是庆子的习惯。她已经二十七岁了，说起话来还这么腼腆，惹人喜爱。

“这回是不是准备布置得美观一点？原来的店，不客气地说，简直好象什么学校的一间教室，真煞风景。那可不怎么样！”

“照你那么说，好象还满宽敞哩！……”庆子笑着说。

她觉得，店堂那么狭小，而麻田却把它比作教室，未免有点滑稽。麻田讲话如此坦率，消除了她原来对他保持的距离。这样

一来，她就想起自己是来谈交易的，她连准备花多少费用都提出来了。

“想请你帮我设计，你能答应吗？”

“试试看吧！”麻田回答说。他好象在追忆什么。停了片刻，然后笑着对庆子说：“这可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活儿呀！”

这一回，庆子没有躲避麻田那带着微笑的视线。两个人之间，产生了某种共鸣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庆子心里摹想着就要开张的新茶馆的景象，与此重叠着，麻田对她说“这可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活儿呀”时的笑容，几度在她心中再现。庆子想：听说麻田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可他当时的面部表情多么象一个青年人呀！

“大家都叫你‘亚那吉’小姐。这样叫，行吗？按照音读法，应该叫‘里乌’小姐。^①到底怎么叫才对呢？”

麻田晋就庆子的姓的叫法，这样提出问题时的情景，也深深地铭刻在她心坎上。她还记得，当时自己曾有点尴尬，只说：“怎么叫都……”她回答的时候，照旧略微提高语尾，后面的话消失在含蓄的微笑中。

“噢！”麻田似乎是从字面上来理解了庆子的回答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然而庆子那含蓄的微笑似乎不折不扣地钻进了他的心，扩散开来。在精神上，庆子略微打了个挺儿，把身子往后一闪，定了定神。这是她灵魂深处的那种对周围经常要保持距离的意识的反射。

庆子记得，到现在为止，关于自己的姓，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追根究底地问过。在和日本孩子一起读书的小学里，老师叫她“亚那吉”，同学们也都这么叫。父母按照日本人的念法，把她的名字

① 日文里，“柳”字的训读是“亚那吉”，音读是“里乌”。

叫作“柯伊克”。所以，小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在父亲的故乡福建省，“柳庆子”这三个字究竟应该怎么念法。刚升进高小的时候，庆子头一次听到一位老师这样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，是‘里乌’吗？”庆子一时回答不上来，只好低头不语。身旁的同学替她回答说：“叫‘亚那吉’。”这样，大家就继续叫她“亚那吉”。后来，庆子还问过她父亲。柳泰明把那被太阳晒黑了的长脖子从敞着的衬衣领口上微微抬起，简捷地回答说：“一个样啊，就叫‘里乌’吧！”

在华侨中间，大家的确都这样叫。但这跟日本的音读一样，所以庆子当时并不相信父亲的回答。她还记得，为了这件事，自己格外感到悲伤，曾经默默地瞧着父亲的喉节在脖子那儿移动。柳泰明的脖子很瘦，他在此地度过的三十年的生活绝不能算是幸运的。庆子在探索麻田的提问的含义的过程中，把这些往事全都想起来了。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往事，居然会如此清晰地浮现出来，庆子感到厌烦，甚至对使她勾起这些往事的麻田都感到厌烦。但庆子的这种感觉，恐怕也不真实。当她想着新茶馆就要开张而挺直腰杆赶回家去的时候，她板起面孔，沉思着。今后，为了筹办新茶馆，她将和麻田更频繁地打交道。这情景，象五月间的毛毛细雨，轻轻地滴落在她的心头。但柳庆子知道，自己是既可以叫作“里乌”也可以叫作“亚那吉”的华侨，她提醒自己，要以清醒的头脑对待这一切。接受了委托以后，说“这可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活儿呀”的麻田，真是言如其人，面貌也清秀得很。

他们俩未来的十年，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新茶馆的改建工作进行得很快。麻田晋不但搞设计，还跟工人们一起干活儿，一会儿钉钉子，一会儿又拿起刷子搞粉刷。新茶馆的门面有四米宽，进深更长一些，用来开茶馆，大小正合适。

店堂内的色彩只有深褐和白两色，除了在橱窗上装了大玻璃以外，一概用木料，显得落落大方。里面的装饰跟只卖茶水、糕点和烤面包的茶馆很相称，摆着腌酸梅用的朴素的中国式小坛子，以及麻田从古董铺里买来的玲珑的煤油灯和玻璃杯。这一切，都贯串着麻田的爱好。柳庆子面对着装饰一新的茶馆，想起被麻田说成好象是学校教室的老店，恍然大悟地感到惭愧。然而，能够整顿出这样精致的茶馆，未尝不可以说是反映着那以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好容易重新站起来的这个城市的面貌。

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麻田晋才热中于这座茶馆的整修工作。战争刚结束以后，头两年没有举办的“D画展”，已经在去年恢复了。从东京还不断传来画家们正在精心创作的消息，这一切都激励了麻田的作画热情。一九三七年以来，他每年都有作品入选，只是在去年未提供作品。所以，今年必须重整旗鼓。他认为：漫长的黑暗时代已经结束，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，在事业上能够有多大成就，就看今后了。热烈的期待和不安交织在一起，这种感情微微地荡漾着，麻田晋内心感到压力，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能够活下来的人的喜悦。过去，他连想也没有想过活下来是件好事。对那些曾几何时已被人们遗忘的死者说来，这是不是幸存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骄傲呢？他觉得与其去回想三年前的往事，倒不如展望未来。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大的劲头来参加茶馆的整修工作。他只穿了一件汗衫，一面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，一面来回地在柜台、柱子和打间墙用的木条子上刷“柿核汁”^①。看他干活时那种专心致志的态度，就象着了迷似的，别人还以为他是为自己的店铺卖力呢。柳庆子深深地被麻田晋干

① 从涩柿子的核里提炼出来的汁子，涂在木料或纸张上可以防腐。

活的劲头所吸引，她自己也勤勤恳恳地帮忙。

“亚那吉小姐！”有一次麻田晋按照周围人们的叫法招呼庆子。“我一直不大好意思开口，想问问你，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把咖啡杯和玻璃杯都换成新的？”

庆子腼腆地红着脸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好呀，我也那么想来着。以前那些都不能用了。”

“咱们一块儿去看看，我替你挑选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庆子用她平素那种简短而提高语尾的声调回答的时候，觉察到自己有些心慌意乱。荡漾在她这个二十七岁的女人身上的这种感情，已经超过了对协助她工作的人的信任。对柳庆子来说，麻田晋是她平生从未遇到过的那种类型的人。庆子好象从来没有被男子如此平等相待过。只有女人才能清清楚楚地觉察到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“优越感”，麻田晋身上一点也没有。庆子作为一个女人，是这么感觉的，麻田还特别留心不去刺激她作为华侨的潜在意识。当麻田问到她的姓应该怎样称呼时，她精神有点紧张，原是出于不必要的对抗情绪。此刻，当柳庆子回想起这一点时，只觉得象是做了什么对不起麻田的事似的。

“我在战争年代去过一次上海，扬子江真宽啊！柳小姐大概还没去过吧？以后也许会有机会去的。能够去一次才好哪！”麻田说。

庆子还是头一次听到一个日本人这样爽朗地提起她的祖国，但是，在这之后，庆子并没有完全打消对麻田的戒心。

“在战争年代，柳小姐你们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吧？”

“不！”庆子回答说，“在战争期间，我们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，都一样啊！”

“是吗？”麻田这么嘟囔了一句。

庆子又重复说：“是的，都一样啊！”

当庆子重复“都一样”的时候，不知麻田有没有体会到微妙地包含在这句话里的意思。但至少麻田未曾点头称是。他真是个好人啊！柳庆子暗暗地想，心头涌起了一阵夹杂着悲伤的复杂感情。

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，不久以后，“茉莉花”茶馆开始营业了。因为这是麻田设计的店铺，所以麻田的朋友们也经常来光顾，生意并不清淡。庆子的两个妹妹都一块儿到茶馆来帮忙。但是庆子总喜欢自己包揽一切，她整天站在柜台里。往往头一天的疲劳还未消失，第二天又忙上了。新生活带来的兴奋使她征服了疲劳。

麻田晋正在创作参加画展的作品的時候，人家要他腾出报社楼下的画室。庆子央求住在新地的一位亲戚，把一间堆房租给了麻田。这间堆房，墙壁是用木头板子钉的，屋顶是用铅铁皮铺的，只有三铺席大小。但这里地处铜座河边上，对于画东山麓的麻田来说，这个距离恰到好处。在所谓长崎风光当中，东山麓和南山麓相同，缓缓倾斜的漫坡上，宽阔的石板路环山蜿蜒。石板路两旁，美丽的瓦房屋顶隐约可见，还有老式的洋房什么的，在明媚的阳光下，洋溢着这条街特有的气氛。麻田晋正在描绘那阳光普照下盘踞山腰并且形状各异的住宅的浓艳，以及那明朗的蓝天的深邃。如今，麻田晋在这种景色中找到了自己作画的主题。

麻田晋完成了“五十号”的中幅油画《东山麓景色》。山麓一隅，呈现在整个画面上。背景是褐色的层峦叠嶂，天空的颜色蓝中带绿，看起来清新悦目。星星点点散布在树林中的住宅，房顶尽皆棕中透红。山岗上还有一座白房子。画下端那宽大的房顶，涂的是粉红色，还用黑线勾了边。这些色彩分布在整个画面上，浓淡相宜。麻田知道：在这幅画中，自己并没有把埋藏在内心深

处的郁闷完全驱散掉。然而这是一幅什么也不强加于人的格调轻松的画。对此，麻田心里不但一清二楚，而且有所不满。他认为，天空的颜色画得好，表现出厚度来了。可是把房顶画成粉红色，这不显得俗气吗？好在边线是黑的，还能压得住！面对着自己这幅已经完成了的画，他这样评论着。

麻田很想去看看久违了的“D 画展”展览厅，并且会一会在东京的朋友们。于是，他带上《东山麓景色》这幅画，从长崎火车站出发了。当时，在晴朗的朝阳的照耀下，浦上丘仍然是光秃秃的一片。

二

这年秋天，浦上丘仍然是光秃秃的。医科大学的灰色建筑，被围在荒草丛中。坍塌了的天主教堂旧址，瓦砾堆积如山，上面倒耷着圣人雕像的脸部和背插双翅的天使雕像的头部。残留下来的一大截红院墙，分外显眼。麻田晋带上刚刚创作的油画，离开这样一座满目疮痍的城市进京了。柳庆子的新茶馆也顺利地开张了。这对两个人说来，都是在继续走自己的路时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。不过，这只能说是他们怀抱的希望和相互激励有了水到渠成的结局，却不能认为周围的环境完全出现了光明。这个城市的气氛，现在也还是沉重的。诚然，这里已经出现革新政党的活动，而且有麻田晋的好朋友参加。那位朋友，战前曾经作为思想犯被逮捕过，刑满出狱后又一直过着软禁式的生活。而现在，他已经公开进行政治活动，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。这个党在筑町菜市场附近一条小胡同里找了一间小房子，作为办事处。房子本来空着，如今搬进桌椅，周围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报纸和传单，就俨然成为一个政党的办事处了，这的确是战败后新颖的现实。这事对麻田来说，也决不是毫不相干的，显然也是他能够意识到的自由的一种表现。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年的年初，当麻田的朋友第二次被逮捕的时候，麻田本人也同时被捕，并且根据所谓

“治安维持法”^①遭受过七个月的“未决拘留”，理由是：他们组织了一个有思想倾向的研究会。那是战时，单就交游关系而论，这理由也能成立。麻田以前对庆子简简单单地提过，他曾到上海去了一趟。那次的上海之行，就是同这个朋友一起去的。这成了当时被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。其实，他只不过是想去看看上海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原因，更谈不到组织上有任何瓜葛。不错，对于那位朋友的思想，麻田的确有所共鸣，这也许是出于一个青年画家对现实的忠实的观察吧。就在度过七个月拘留生活的那一年，麻田也照样向“D画展”送去作品，并且入选了。那幅画，题目叫作《夜店》，是一幅保持着惯有的抒情风格的画。麻田的作品虽然大多是风景画，但不论画静物还是画人物，都能在庄重而有理性的柔和中，表现出抒情诗一般的意境。用色淡雅而不浓烈，却显得很美。可以说，他是想用轻松的笔触，通过细节的刻画，追求一种形象美。今年春天，他曾为那位朋友担任负责人的革新政党画了一张宣传画。但在这张画上，他画出来的工人总使人感到缺乏英雄气概。他在朋友们的批评下，承认了这个缺点，不得不报以苦笑。

麻田晋这幅画，也维妙维肖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人品。

“正象大家所说，我画的工人是缺乏战斗性的。很抱歉，这么画可不行啊！”

在朋友们面前苦笑着的麻田晋，虽然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但看上去表情是斯文的，性格是内向的，他不乏三十三岁男子汉的丈夫气概，但却丝毫没有粗野的表情。

^①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公布的、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的反动法律，一九四五年废除。

革新政党要求宣传画上的工人形象具有英雄气概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麻田晋觉得，从自己的画风来说，画不了那样的画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宣传画上的工人形象没画好，但这不等于说自己的画被否定了。他只不过是当时在场的朋友们感到抱歉。大家看着宣传画说，画上的工人必须具有战斗性。麻田想起来，那位担任负责人的朋友，也是对长崎的灾难抱有怨恨的人们之一。三年前八月九日那一天，朋友的妻子正在三菱兵工厂干着活儿，就被炸死了，连尸首也没找到。作为一个思想犯的妻子，她在这个小城市里庇护着丈夫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。她那目光炯炯的眼睛里总好象隐藏着什么。麻田对她很熟悉，因为这个代替不能就业的丈夫干活的、皮肤白皙的小个子女人，每逢丈夫的朋友来访，自己也参加闲谈，手脚麻俐地张罗着。麻田自然也很明白，已经成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朋友，为什么要单身住在办事处里，而且难得露出笑容。关于妻子的死，那位朋友几乎从来不谈，显然是由于至今这件事还使他感到剧烈的痛苦。麻田也避免触及朋友的这个痛处。但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这样做。相反的，有时候他还会忽然觉得：老朋友见了面怎么都无话可说？

柳庆子也是这样，每天一声不响地站在新开张的店铺里，热心地经营着“茉莉花”茶馆。那一次，当麻田晋由于同情庆子身为华侨的处境，曾经问她：“在战争年代……你们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吧？”当时，庆子虽然立即回答：“不！……我们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，都一样啊！”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她自己已经明确认识到这个回答是如何的微妙。其实，庆子也许只不过觉得有必要坚持“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”这种说法而已。芦沟桥事变爆发之际，住在长崎的华侨也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人被逮捕。庆子家当然不会例外。父亲柳泰明被关押起来了。当时庆子十六岁了，母亲

凡事都要跟她商量，她自己心里也怕得要命。传闻在被逮捕的华侨当中，有的已经被“遣返本国”，不管在原籍有无亲属，就硬给装上了船。倘若父亲也被送走，那可怎么办？这种不安经常萦回在少女的心头。但是，母亲并没有担心到这种地步，因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经验：在长崎，华侨的历史是悠久的。定居馆内、新地一带的华侨的存在，业已发展为构成这些街道的一大要素。母亲自己也出生在长崎，是所谓“第二代华侨”。比起丈夫来，母亲还有更挂念的事，那就是：到上海去谋生的大儿子，恐怕再也不能平平安安地回到长崎了吧？

父亲被关押了二十天才回家。追究他作为一个旅日华侨，对所谓“日华事变”的态度，还调查了他平日的言行，这都是意料中的事。关于这些，柳泰明回家后什么也没说。以芦沟桥事变为导火线，所谓“日华事变”的战争，在中国扩大了。在长崎，人们也挥动着小小的太阳旗把士兵送走。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，庆子并不完全理解，只好把它当作眼前的现实加以接受罢了。但从这时候起，华侨被禁止离开长崎了。即便如此，对庆子他们说来，也没有格外感到不自由。庆子他们先前又何尝能到长崎以外的地方去呢？由于家境贫寒，庆子几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长崎。自然，就是在这条街上，她的活动范围也十分狭小。从那以后，庆子他们的生活，正象她自己所说，是“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”的。对柳家来说，最大的灾难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，庆子的哥哥在从上海回长崎的途中，不幸死在海上。他乘的那条船触水雷沉没了，乘客和船员大部分都没有得救。庆子的哥哥是乘那条船的少数中国人当中的一个。他也许是想趁早回来跟双亲和妹妹们团聚，不料，他和很多日本人一起，在离长崎不远的海里淹死了。大儿子是柳家的独子，他这一死，使全家失去了最可靠的希望。